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成果

Ji Cheng yu Fan Si

金元浦◎等著

继承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
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

创新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动力源。
对于传统理论的质疑，是改革创新起点，
而理论探索的开放则是一切创新和改革的前提。

本书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研究”(05JJD750.11-44006)结项成果之二

金元浦 等著

继承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
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继承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当代
文艺学建设的影响 / 金元浦著 .—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93-0000-5

I. ①继… II. ①金…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
—影响—文艺学—研究—中国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282 号

责任编辑：朱前前

封面设计：美信书装设计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100006）

网 址：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http://qycbs.shop.kongfz.com>（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48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193-0000-5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影响研究是关于历史、关于承传、关于接受、关于变异、关于创新的研究。当代解释学(阐释学、诠释学、释义学)和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告诉我们,人类所有的文化与学术从来就是在历史中生成、发展的,可以说,任何哲学、美学与文化艺术理论,都通过理解的发生而进入历史,进入存在。无疑,历史与当代之间价值、意义以及时空上必然存在着距离。传统的历史主义认为,此一时代的人,可以越出他的历史存在的局限,通过复原历史的“正确”、“客观”的中立的方法论,消除自身的现在性,克服乃至去除他的历史存在局限,由理解进入另一历史时代,重现那个时代的本来面目。在这种传统的历史主义看来,历史上的许多研究,由于没有采取“客观”“中立”的方法,摒除自己的偏见和主观局限,才无法重现那一失去的时代,那是方法的无能和掌握方法的无能。在这种看法中,历史被认为是方法运用的对象,而这一命题中本身就先在地认定了方法与历史、认知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分离。

而在哲学解释学看来:“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历史主义的幼稚假定,即我们必须置身于时代的精神中,我们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从而能够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惯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²所以,解释学认为,历史不可能通过所谓客观、中立的方法去达致,历史本身通

1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研究”(05JJD750.11-44006)成果之一。

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第381页。

过语言无所不在地浸透于每一个人的理解和方法的应用中，它表现为主体的前理解，由前理解而形成的理解和理解的角度、理解的方法以及应用的个人方式或特色。每个人对意义的理解都不可能使自己站在历史之外，视历史为与自己分离的对象，从而用方法去加以把握，在历史属于我们之前，我们早已属于历史，这是任何人都无可逃遁的宿命。历史就是由存在上的关系——语言、传统、历史文化而进入每一时代，也规定着、影响着人们的理解活动。所以当代解释学的意义观是将影响与历史、影响与现实、影响与当下人自身的存在放在一个共同点——时间性上来考虑，这就是人的历史性，也即影响研究的历史性。它揭示了前此盛行的“历史主义”中的非历史性，为我们研究人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

学术在历史的变革中发展形成了影响史——解释学称效果历史。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关于文艺美学文艺理论的阐释都不可能逃逸于影响史/效果历史之外。它同时也与每一个当下的阐释发生对话，影响并改变着当下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进路，并构成影响史/效果历史的一部分。在这里，影响史并不是阐释所面对的对象，而是一种既定范式下学术共同体谋划、选择、取舍历史的结果，是理解发生于其中的一种主题与对象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成果。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釋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¹

当代解释学的影响观是动态的历史观。它认为，历史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历史永远是一个不完整体。但我们从来就是把历史作为“过去”来理解而忘记了它是一个永远不可完结的过程。黑格尔就曾把历史真理规定为整体性。我们也一直认为，我们只要能够把握过去的历史，我们便可从中把握历史的真理，而我们对历史真理的把握，就是对历史整体性的把握。

然而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历史作为过程是未完成的，并不具备作为整体的资格，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断言，他们已然到达历史的终点。在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译者序言，第8页。

每一代人的前面，都绵延着无尽的历史的未来。历史永远指向未来。它之所以总有未来，就因为历史永远处在未完成状态。易言之，历史只有在与现代和将来的联系中。才成为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本质：未定性。然而，历史的阶段性和部分已然性又总是使每一代人自觉不自觉地相信，他们能够把握历史的整体性，自信他们能够在历史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把握住包括未来在内的历史的整体性。这是由于实证主义时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胜利使人们忘记了历史作为人文科学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缘故，科学的霸权同时把机械反映论与唯心历史观引入精神领域。人们忘记了历史的过程性，也就是忘记了每一代人与历史之间的两极关系：人与历史之间永远包含着过去与未来这两极、两重关系或两个指向，他们作为现时存在不得不居于历史与未来之间。但他们自己却始终以为，他们在做着完结历史的事业，声称已了然历史的全过程，并把这种知识视为历史自身的真理。黑格尔就是这样，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曾将历史的运动过程描述为一个向创造它的绝对精神复归的逻辑运动。黑格尔似乎坚信，他那一代人的理解与智慧终能将历史的整体性——过去、现在与未来全部彰显无遗。然而，曾几何时，历史自身对黑格尔任意切割的历史作出了否定。

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一直都患有一种非历史的幼稚病，以为历史及其意义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某种客观存在物，它先于解释者而存在。然而历史绝不是一个被现代远远抛在鲁滨逊的荒岛上的自在的过去，历史总是我们现在所认为所理解的那个历史。易言之，历史是为我们的现在与将来而存在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要解释历史而不可能将之斩断，就因为历史具有这种关系。我们把历史的过去解释成什么，我们也就可能把历史的现在和将来解释成什么。历史永远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绝不可能封闭，而必然永远处于开放状态。它总是等待着后人去完成。

所以，作为影响史 / 效果历史的一个环节，我们来了，我们试图以自身的理解来描述这一过程，成为观念变革发展的一个小结，一个节点，一种话语，一种学术的假设，立此存照。而影响史则永远是过程，它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处于未决状态。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不会完结的影响史的过程，我们也试图不断地去研究和接受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家面对新世纪的最新的探索，因为，一是这种影响是在实实在在的发生之中，它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下文化艺术的现实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和共同性；一是这些理论观念体现的探索的创新的精神，对于我们有着很强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我一直坚持认为，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艺美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依然在迅猛发展，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而一代一代新/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在不断诞生、成长，或被发掘。

是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可以说，自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之后，对其命运的重新思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世界情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如何在新的形势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学者热切关注的焦点。

历史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未定性，因而总具有模糊性。历史保持了它不可穷尽的未定性，并不说明解释历史的方法无能（但人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使我们无法对历史作终极性洞察。而是因为历史的未定性植根于人的经验的不可重复性之中，而人经验的不可重复性则正是人的历史性的生动体现。

意义的历史观自然还包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包含意义资源的承传选择的特定方式，以及意义增生衰减的效应史的运行过程。

意义是人类全部文化文明的人类学历史成果。意义的历史性首先表现为意义与传统的关系。哲学解释学告诉我们，意义永远处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承传之链中，任何一个阐释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都必须从已有的传统这一具体的立足点进入解释，即使是与传统观点彻底“决裂”，也须从这一基础开始，而不能“天马行空”或建筑“空中楼阁”。任何意义也都不可能是无米之炊。这是历史的实践性决定的，除了已先在拥有一种前理解结构外，它还必须先期拥有足够的思想资源，这包括前人的各种历史文本，对历史的陈述，对历史意义的阐发或再阐发，其发生演变的历史，此即所谓解释的境况。任何当代意义的生成都是对历史的意义资源承传、选择、判断和创造的结果。我们属于传统远远大于传统属于我们。我们有不理解传统的自由，但我们没有不生活于其中的自由。前一种是认识上的自由，后一种是存在上的不自由。但是，从传统出发是说我们无法拆除我们所据以立足的土地，而不是说解释传统就是翻拣古典、复活死物，无关当下，无关个体，无关今日的生存。解释传统包含着过去与今天乃至与未来的联系，包含着解释者对自己以及现时境遇的解释、判断、反省与思考。解释传统就是解释现在，解释自我。解释就是传统存在的方式，

承传的方式。解释不仅仅是接纳、肯定、阐扬，同时包括选择、批判、否定和舍弃。意义在历史中的生成既包括正面的理解历史也包括负面地批判历史。在这里，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从社会历史角度强调解释对历史和传统的批判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客体(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幻象，而将学会在客体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真正的历史客体根本就不是客体，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本，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釋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¹因此伽达默尔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在这里，理解按其本性被看作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

传统认识方式中，主客体两极分立，视“客体”完全独立于“主体”的历史客观主义，实际上忽略了也掩盖了历史意识本身正参与了历史的构成和“制作”这一事实。理解本身即为历史之一部分，因为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是独立自在与他者绝缘的客体，而必须同时包含他者的理解史。也就是说，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合理地存在着一种两重性：它一方面用来指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又用来指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

在分别考察了意义的语言性和历史观之后我们看到，当代解释学坚认，意义的语言性和历史性之间有着基本的内在联系。能把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是书面本文。本文只要诞生就已是过去的东西，它只要被阅读，就在不断地生成意义。在阅读中阐释者和本文之间的关系弥合了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历史间距。这一关系是解释性的。解释的关系是一种语言现象，或者说是语言性的现象，而这一语言现象总是历史的。你所见到的本文语言必然在说着什么，这一说着什么的特定语言只要在说，它就必然与某一特定历史情境相联系。这里的“语言”就是历史情境与当下际遇的方式，是阐释者对其设问并找到回答的方式，也是在背景中将主导前景凸现出来的方式。然而这一“语言”都是由说不同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阐释者在同一篇本文中发现的。这时，其历史差异便同时是一种语言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悖论：一方面，不通过语言，过去与当下的历史差异便无从比较，另一方面，通过语言，过去与当下又必然衍生新的差异，一方面不通过语言，历史与现在的理解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第384—385页。

会通也就无从产生，而另一方面，通过语言又不能完整复现历史原象。语言既不是历史差异的完全克服，也不是过去与现在的截然分裂。在阐释者与本文在语言中际遇时，阐释总是一种揭示，一种彰显，一种揭幕，使其原本模糊的本文特征显示出来；但同时，一种当下的特定阐释也只是彰显本文的“这样一种”意义，而将其他的特征或意义掩盖起来或使之隐入背景。因此，历史发展中的语言阐释由于它总是具体的特定的阐释，因而才是自我确立的，有独特内涵的，但又由于它总是具体的特定的阐释，因而它不可能穷尽本文，揭示全体，而总是需要进一步的揭示与掩蔽的行为，也就是说，语言又作为历史的本质而为历史开辟道路，开放历史理解无限的可能性。

在文学中，正是这种意义生成的语言性和历史性的内在关联，使我们便于洞明诗的本文的内涵性解释与历史性之间的根本冲突。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坚持本文总是有其自己的完整内涵，有其形式风格的独特创造，从而是自足自律的语言本体；另一方面，对本文的解释却总是多样的、偏颇的或人言人殊的，从而阐释总是历史的、变动的。二者的沟通正在于本文解释的历史过程之中。解释学不承认绝对不变的本文固有内涵，它主张诗的本文和释义的本文都是由历史增删变异的。诗的本文一旦由书写固定，本文的语言便从两重束缚中释放出来，其一是本文语言从作者的意图、心理中挣脱出来，成为向一切合理阐释开放的本文；其二是从共时语言系统中释放出来作为一种话语存在向一切时代的理解的语言开放。诗的本文总需阅读，阅读总是阐释。任何一种阐释都会产生涨破作者期待的本文内涵和打破共时语言系统的意义生成。这些意义就不再是作者的预期，也不再是读者的期待。作为一种意义成果它又会产生对相应行为的需要。在意义阐释中符合诗的本文的，也就符合阐释本文。常常是阐释本文似乎为诗的本文提供了新解，但在时间流程中，它可能逐渐成了诗的内涵的一部分。在意义史的沉积和筛选中，阐释的历史性逐渐“刊落铅华”，成了诗的本文的内涵性，它似乎不再是历史上的特定阐释理解了。而实际上，它永远是语言与历史对话的产物，是诗与阐释者的对话，它们总要彼此成为语境，彼此进入对方。因为，诗的本文妄想“活着”，想被理解，就必须从事生成意义的对话——阐释。

问题一：文学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上可以对所谓本质、本体进行概括与抽象，但它是否拥有一种永远确定不移的唯一的本质？是否只要我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辩证地概括，正确地认识，就一定能揭示文学的确定不移的本质？真理是否只有一个，所以这种本质是统贯一切文学现象的，与之相应，必然有一

种一统的文学理论体系来揭示文学唯一的本质？

问题二：文学的本质是文学固有的属性，是否恒久地存在于那里，像地下的矿藏，等待你的发掘。只要你去找，就一定能够找到。如果你没能发掘到它的本质，那是你的认识的失误和你的方法的无能？

问题三：文学是否是一种“永恒的真理”，是超越时间的亘古不变的东西？如果文学拥有真理，那么它是否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能够超越地域、超越国度、超越民族和超越文化，而具有面对一切文学难题都迎刃而解的能力？

文学并不拥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唯一的本质，这并不是说文学不可以进行抽象的概括，而是说文学一直处于内外两个维度（现实与本体）的变动中，处在常态与转型两种形态的发展中。因此，文学理论史也从来没有真正找到文学唯一的本质，也不可能找到一种真正统贯一切的一统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今天文学领域的所有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都不是天生就有的，不是唯一的，不是亘古不变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同人们理解的那样，它是由人所建构的，是人们在一种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创立的，是在一种文化传承机制和知识传播构架中阐释、选择和构建的。它不是客观的物质构成，而是主体间交互对话并约定的产物。

真理是永不完结的过程，真理是无尽真理性的集合。文学永远在过程之中，文学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所以文学理论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或最后的真理，而多元主义文学观展示了“范式多元、话语丛集”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

文学当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路径与方式，作为其理论掌握形态的文艺学的发展也有其相应的发展轨迹。当代文学是在不同的文艺学范式指导下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文艺学话语的演变史、更替史和丛集史。

001 | 前 言

001		绪 论	观念的变革
020		第一章	关于美是生活 —— 50—60 年代
029		第二章	关于美学大讨论
038		第三章	“自然性—社会性”论争
045		第四章	“实践论美学”
066		第五章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075		第六章	中国新世纪初美学与文艺学的变革
096		第七章	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与中国文艺学
102		第八章	“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现代性”
120		第九章	“生活美学”的本体论转向
130		第十章	接受美学与我国当代文艺学
162		第十一章	文化研究的美学与当代中国文艺学
184		第十二章	视觉美学对中国当代艺术形态的影响
219		第十三章	大众通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影响
229		第十四章	身体美学与当代文艺学
243		第十五章	生态美学与我国当代文艺学
271		第十六章	“艺术的终结”与美学、文艺学的变革

307 | 后 记

绪 论 | 观念的变革

创新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动力源。对于传统理论的质疑，是改革创新起点，而理论探索的开放则是一切创新和改革的前提。

文艺学的问题意识

人类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解释总是以一种有限的框架去对无限时空中生生不息的对象世界予以框定，唯其无限，才只能以这种有限的方式去把握，否则世界无以认识，而一旦框定又只能是对无限世界的割裂、剖分与固着，失却了其无限发展的本态和解释方式的无限多样性。人类的这种认识、把握、解释只能通过解释实践的无限的试错性而永远趋于接近世界本身的过程之中。在伽达默尔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90页，译文有改动。）文学像其他所有学科一样，不可能拥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这就是解释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为什么？因为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解释者，任何一个共同体（作家共同体、读者共同体、批评家共同体）都不可能以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去“忠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或映照文学作品本身，而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也就是说，他（他们）必然已经先在拥有某种关于文学的理念、范式、话语、范畴（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觉意识到），并只能依照这种框架来理解和解释文学。不懂某种语言文字，不了解某一国度、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背景与特征，不具备有关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不了解某一范式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进入文学的理解、解释或研究，就不能或无法玩这种游戏。一句话，前理解展开了理解的可能性，没有前理解构架就不可能

有理解。而每一理解都是向文学对象提出问题，抛出问题，是理解主体（前理解）向对象的一种抛掷、投射，对对象的一种设计或曰筹划。人们读文学，理解、解释或研究文学，总是因为什么并把文学当作什么来阅读、来寻找、来幻想、来享受的。这种“因为什么”、“要做什么”，就是提问的根本性、首要性。文艺学的研究就是向着文学对象的理解或解释的可能性寻找或成就它的本己的存在。所以伽达默尔不无感慨地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¹。这就是说，一种文学批评的范式总是首先向文学对象抛出问题，并等待着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回馈或回答，这种回拨的反弹是被问题所制约和限定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回答。

从文艺学的发生发展史角度来看，对文学的理解解释从来都是依据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范式规定性、方法论要求或各不同话语之间的游戏规则来进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属论、工具论的一统论独断论文学观，依循一种黑格尔式的“绝对知识”的终极性主张，怀着对人类“无限理智”的绝对信仰，对文学采取一种删略前提、删略语境、删略条件的绝对论文学观，对认识和解释文学对象的多种可能性，即多种范式多种话语采取坚决排斥的态度，只允许一种文学理论“独裁”或“专政”。大大阻碍或延缓了我们对文学的解释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对于文学本质的反独断论或非本质主义思考，就是通过重新提问或转换提问角度来实现的。所谓“重新提问”就是将文学“作为不同于过去设定的理念的另一种新的什么”或“当作新意识到的某种东西”来认识。一方面，任何“重新提问”都是对过去既成理念、规范和定义的怀疑和重审。怀疑或“重新提问”需要提供理由。另一方面，“重新提问”又表明文学自身发生了重要的变革或转折。重新提问使作为提问对象的文学再次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使它保有再次拥有各种解释的可能性。文学研究中的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要求具有这种敞开性。

每一种新的文学范式，都是一种新的向世界提问的方式。选择了一种提问方式，就选择了一种区别真假命题的标准与尺度，也就选择了一种回答问题的方式。范式的实质即在于它是一种根本性的提问活动。过去时代不同文学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首先就表现为问题群的不同，其中此一范式的问题不构成他一范式的问题（不进入他一范式的视域），或者此一范式的核心问题不构成他一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66页。

范式的核心问题(不构成他一范式的主导因)。比如传统批评中的倾向性与典型论,作为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上产生的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论的反映论的理解,它们无疑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核心问题。但是在20世纪言论转向的现实条件下,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来说,它们就变得无足轻重或湮灭不彰了。独断论时代的“我们认为……”,是一种代表真理和公众的标志语式,是建构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的“导语”,是发现规律和揭示规律的过程。这种观念下的“我们认为它是这样”,就意味着可以推断它就是这样,这就是“真理”,这就是“规律”。而在当下范式多元共生、话语多样并存的多元语境中,“在我(或任何一个人)看来……”它——文学——并不能被断定它被所有的人认定就是这样。所有的理论、范式、话语都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假说或预设。“在我看来”已变成一种对自己所采取或遵循的何种范式何种话语的说明,是拥有何种“先见”或前理解框架的“夫子自道”,它成了一种对理论前提的设定,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预程序。

当代文学的范式理论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作为其理论掌握形态的文艺学的发展也有其相应的发展轨迹。当代文学是在不同的文艺学范式指导下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文艺学的演变史与更替史。

范式,英文为 Paradigm,该字源出于希腊文,含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库恩认为,任何一种常规科学都是一种模式,“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共同掌握并必须遵守的一般原理、模型和范例。

同自然科学研究相似,过去时代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也有本学科的主导范式。它是一定时期一定国度(民族、地域)内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的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方法论规定、价值标准、符号系统、逻辑运演程序和模态范例。文学研究在进入成熟的科学化形态之后,便拥有了占据批评主导地位的文艺学模式。每一种新的范式都必须对全部既定的文学原则进行重新的解释,同时还必须确定批评、研究文学的基本方法论程序,也即创造一套解释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规则,由此也创造了解释的对象。

同科学范式具有自身的规定性一样,文艺学范式也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它不同于文学中的一般流派或风格群,它是对全部文学现象进行的总体观

照，是一定时期内文学共同体总的“看问题的方式”，是规范整个文学研究活动的整体框架。它以不同的哲学美学思想为其基础，但又具有具体学科所固定的范围和内涵。不同的文学范式又规定了不同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和价值功能取向；同时也就确定了不同的批评的方法论程序和逻辑运作模型，并据此产生不同的文学史。

以往大一统的文学理论只允许有一套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和概念体系，但文学批评的现实已经打破了这一藩篱，展示并现实地运用着多种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核心范畴的并展共陈，我们将之称为关键词。一套关键词不仅是文献检索的根词，也不仅是当下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漂移的能指，而且是内在地揭橥着一种话语体系的构架、趋向与适用域。

每一种文学范式都须通过经典范例进行示范教育和本范式的理论学习，赢得并形成相当范围的文学共同体。文学共同体是某一文学批评流派推出的理论模型因重大的学术成果成为公认的主导范式后受到多数研究者拥护而形成的范式圈。它是一种具有共同范式的无界限的专业知识集体。其成员一般来说具有共同的文学理论原则，采用共同的批评模型，具有大致相似的前理解或期待视野。共同的目标或理论指向使他们具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更充分的互相交流。他们关注同一类文献、文本或文本中的要素，有共同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的文学共同体专注于文学中不同的对象，或同一对象中不同的侧面。即使不同范式中所具有的相同概念，其涵义和在各范式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

文艺学的发展有着与自然科学发展大体相近的发展进程。文学研究并不是依靠一代代研究者不断积累文学事实和考据结果逐步接近文学本质的过程。文艺学的发展既有量变的常态研究时期，也有质的飞跃和范式的突变时期，而正是这种质的飞跃和范式的突变极大地推进了文艺学的发展。

在文学研究中，也不存在亘古不变的一统的批评范式。文艺学范式依据文学的发展、变革而移易、转型以至更替。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某一曾经指导过文学研究的批评范式，不管它曾经如何有效如何成功地推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不管它是否曾经为文学共同体公认为“金科玉律”，只要它不再能够指导人们面对文学的现实问题去“解难题”，不再能够满足批评共同体大多数人的研究需要，它就必然会被扬弃，而被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一种更适应于文学的现实发展的，独立于旧范式的新范式取而代之或包而容之。

文学研究的转型期

纵观文学研究的历史，文艺学范式的运作有这样一个逻辑程式：

文艺学前科学→常规研究(形成范式)→反常→危机(非常态时期)→文艺学范式变革(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新常规研究

随着文学的前科学阶段的结束，文艺学在多种理论长期论辩和竞争的基础上，由于重大理论成果的突破或引进，形成了公认的范式，进入了常规研究时期。文学的常规研究本质上是文学共同体在某一范式支配下的“解难题活动”。这是一种基于其范式本质观的高度确定的活动，其研究定向聚焦于范式内部肯定有解的难题，而不是所有问题不论巨细一概研究。范式规定了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程序，常规研究进行具体对象的运演和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常规研究须以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史研究的实绩验证、充实和扩展范式。常规研究追求量的积累和系统的精确化，不断扩大文学共同体的范围，努力排除或消化溢出范式的反常现象。常规倾向于聚敛式思维，这种思维要求研究者严格遵守范式，完全依据理论原则和运演规范，着力于范式提出的“疑点”研究，以求研究之“深”。

当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越来越突破常规范式固定的界限，出现大量使文学共同体无法依照原范式解释的难题时，当一种曾经相当完善的理论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文学对象显示出重大缺陷时，文学研究便出现了反常。反常逐步增多，引起人们对原有范式的整个概念体系的怀疑，激发研究者打开思路，开拓新的视野，去检验长期信奉的观念是否绝对正确，从而导致新的发现。

原有的范式则力图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它往往不能容忍反常现象对理论的冲击，总要千方百计抵抗和消融反常。而且，旧范式的追随者由于视野和前理解的局限，对那些溢出旧范式的现象，实际上根本看不到，而对无法回避的反常则力图通过对范式的修补而达到消弥。反常引起发现，发现引起新的探索性的模糊的理论设计，发现越多，探索性的理论构想就越多。当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文艺学范式的危机时期便到来了。文学进入非常态的范式交替转换期。这时，人们纷纷开始向原有范式发难，检讨、审视其固有原则及各种概念，

激烈否定其中已被淘汰的内容。随后各种竞争新的主导范式的预选模式竞相设计出来，各种理论往往以崭新的体系形态昭告于世，一一在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上初试身手，形成“百家争鸣”的异彩纷呈的热烈局面。

在非常态的危机时期，原有的文艺学范式的中心或主导地位丧失或被消解，文学研究呈多元或多中心状态。其表现为：

1. 对方法论的迫切需求与高度重视。由于原有范式已无法对现实生活中的文学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曾经显赫一时的经典教条面对新的文学思路束手无策，因此人们转而从一切能够找到的理论武库中去搜寻合用的利器，尽力拓展研究的视野，探索各种新的方法。这首先表现为大量翻译和引进国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次是展开学科的边缘交叉研究，移植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新方法；而跨国的比较理论研究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2. 更新观念，破除既定的陈规惯例。危机时期是文学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原有的观念体系和价值系统丧失了往日的权威，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由先前的聚敛式思维转变为发散式思维，学科的批判与否定意识空前高涨。人们从历史巨人的庞大身影中走出，开始了对观念本身的叩问。与此同时，社会的理论创造机制异常活跃起来，众多流派纷呈，研究者们面对历史的契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体系情结”，他们对创立新理论、新体系，对提出新观念具有异乎寻常的热情。新（新颖、新奇、创新）被推为文学的重要特征。

3. 建构新的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在危机时期的创新热潮中，新名词、新术语扑面而来，新概念、新话语层见迭出。形成了概念术语大爆炸的学术局面，出现了严重的“读不懂”现象。这一方面源于不同范式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人们各遵其法，各称其事，如操不同方言的人互相交谈，双方难以会意；另一方面源于对引进理论的生吞活剥，未加消化。名词大轰炸和新话语方式造成思维短路和理解障碍，批评在热过后留下深长的困惑。

4. 文学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危机时期，原有的文学共同体解体，其成员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已形成僵化固定的旧范式的思维模型，并真诚信奉自己原有的理论范式。尽管他们无法否认旧范式中频繁出现的反常现象，但总是企图修补、完善或重新解释旧范式，以消融或弥合反常，形成滞后的旧范式变形期。而另一部分人则不再盲目迷信旧范式，他们勇于探索，积极寻找、借鉴和创立新理论、新范式，以重新解释和吸收反常。在文学批评发展中，往往是一批年轻的批评家以卓越的理论贡献赢得普遍赞同，从而逐步形成新的文学共同体。